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二十一世紀評論」的多個專題討論，不僅引發作者之間的互相詰問切磋，也有不少讀者在本欄發表簡短犀利的意見。但更難得的是，研究對象站出來談有關問題。因此，出身農民而如今「非農化」的鄭全民先生，作為本刊讀者於97年元旦寫信給編輯室，不能不令編者感到欣慰，相信作者（研究者）也願意聽到他的意見。我們更希望各地讀者、作者利用本欄發表雖然簡小卻又及時的意見和評議。

——編者

「非農化」不可逆

讀96年12月號上一組關於90年代中國的農民非農化的文章，感想良多。儘管對文中某些觀點不敢苟同，但出身農民如今卻「非農化」了的我，對三位學者能以理性和真誠的目光，而不用憐憫或蔑視的態度（國內的不少知識份子帶有這樣的態度，其實該憐憫或蔑視的倒往往是他們自己）來考察和研究中國的農民問題深表敬意和謝意。

據我看來，中國的農民並非一個同質性很強的群體，加之歷史文化的深厚、地域的廣闊和「有特色」的社會制度，農

民非農化的動因、方式及影響都複雜多樣，故不可能套用現成的理論模型，也難以借助簡單的抽樣調研就作出正確的理論概括。不過，有一點我則堅信，中國農民的非農化過程已經不可逆轉，很難想像有誰真能建立「現代保甲制度」把他們重新禁錮在「希望的田野上」。因為非農化已成為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強大原動力。

所以，問題在於該如何順應這一歷史性的轉變，以發揮其正面效應並減少需付的代價。三位學者在這方面都已有闡述。我以為，在研究過程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鑒於非農化有着不同的途徑（如就地轉移、外出務工）和流入地（如大城市、工業化了的農村地區），因而有必要分別加以研究，以便能作出正確的理論概括和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第二，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步，又有特殊的國情，故非農化的過程與發達國家以往的遷移模式相比會有很大不同。這固然要求關心中國農民前途和命運的學者作大量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但同時也提供了從事創造性研究的極好機會。

鄭全民 上海

97.1.1

政治改革不可能 畢其功於一役

貴刊96年6月號和10月號上有關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宏論與答辯，可以說是緊扣住當前一個最大最難也是最敏感的問題。吳國光、鄭永年二先生的許多高論，頗能啟發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以中國這樣的規模，不解決中央與省級地方的關係問題，就邁不出掙脫統治分治亂循環泥潭的關鍵一步。另一方面，甘陽先生從相反角度的設想，也不是沒有參考價值。這裏我僅就一些不同的看法略談幾句。

首先，我認為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政治的大難題，「徹底奠定」現代政治社會，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對一個學者來說就有點說不過去了。甘先生與吳、鄭二先生的分歧，我認為主要正是在心態上的不同。

甘先生的立論，我認為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用所謂的公民直選國家元首來加強中央集權。這裏且不說組織、技術層面的可行性問題，只就從理論方面來講，把現代政治社會的建構主要歸結於國家中央與公民個人的直接聯繫，就未免忽視了現代政治社會結構之多層次性、多元性等基本特徵。況且，無論在任何國家社會中，大眾的成員作為個人的直接政治參與，都只能也只宜在相當小的範圍內實現。而現代社會之不同於傳統社會的主要一點，就是公民個人可以通過各種各類各層次的、當然也包括

地域性的組織和團體實現其廣泛得多、深刻得多的參與。中國大陸之所以遲遲不能步入現代民主社會的殿堂，缺乏由制度保障和規範的個人與首腦之間的普遍存在的政治組織與團體，不能不說是主要因素之一。

至於有關美國建國的經驗，甘文所述似有些離題。美國當時的問題是怎樣加強聯合與統一，即怎樣由邦聯走向聯邦，而並不是要從聯邦走向中央集權的單一國，藉以開創在大國保持穩定民主制度的先例。在其中，地方分權（州權）和中央權力的加強是同等重要的。「在美國的複合共和國裏，人民交出的權力首先分給兩種不同的政府，然後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權力再分給幾個分立的部門。因此，人民的權利就有了雙重保障。兩種政府將互相控制，同時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沒有這種雙重保障，即使有公民直選，也不會超過空頭招牌的水平。大國實行聯邦制（最近的如俄國）是現代民主建制的通例。中國大陸民主建設的路徑恰與當年的美國相反，是從緊到鬆，而不是從鬆到緊，因此是不能襲其舊轍的。但聯邦制模式（即使形式上不稱聯邦之類）的歷史經驗，卻是不容迴避的政治資源。

平心而論，甘先生有關中國大陸黨制轉型的設想，倒還是相當貼切的。這樣緊扣現實，才會產生政治改革的可行之策。「書生之見」未必盡迂腐

也。當然，我也希望能看到甘先生對吳、鄭二先生回應的回應。

任漢生 鄭州

96.11.26

呼喚大學自由精神之魂

剛剛讀完了12月號的《二十一世紀》，大概是與我最近的興奮點有關的緣故，我對謝泳有關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的文章很感興趣。我記得，在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也曾經伴隨着出現過一種「知識份子熱」的現象。然而，當時熱則熱矣，卻大多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真正的紮實的學術研究卻甚少。十年過去了，相對於其他研究，這方面的學術積累還是很有限的。因此，謝泳的研究就格外有其意義。我特別贊成該文所引用的張起鈞先生的看法，即西南聯大不僅是一個高等學府，而且還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政治中心」。

在現代社會，知識份子之所以是知識份子，而不僅是從事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專家，是與哈伯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的存在分不開的：公共傳媒、民間社團、同人雜誌、同人沙龍等等。在公共領域之中，大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學不僅是知識份子的棲身之地，而且也是生產新的思想、領導社會輿論的堡壘，它與傳媒一起成為政府與財團之外的第三中心。西南聯大當時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和功能。自由主義精神之所以能夠在1949年以前光大一時，實與大學的氛圍分不開。這樣的精神直到

1949年以後才在大陸消失。90年代以來，儘管市場經濟較80年代大大強化了，但公共領域在權力與金錢的雙重圍剿下反而萎縮了。大學更成為出賣文憑的學店，不要說領導輿論，連自身的學術標準也建立不了。一個時代的精英，是由一個時代的大學氛圍培育出來的，如今，大學風氣之頹敗，令我們這些至今仍在大學教書的人深感壓抑。雖然，「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叫得震天響，教育的投入也較以前增加，但大學之魂卻沒有了。這個魂不是別的，就是作為公共領域所必須的自由精神。

讀者 上海

96.12.29

經濟學人在鼓吹甚麼

據我看來，如果不去正視中國目前的諸多問題，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如今這情況已不比當年「八九」以前。那時尚有計劃經濟老本可吃，國有企業「改革」還沒真正開始；自發私有化對國家資源瓜分剛剛開頭，失業問題尚未顯露，農村剩餘勞動力似乎還有地方可轉移，黑權結合的苗頭還沒嶄露，人的道德還遠沒有今天這般墮落，社會治安形勢也沒有今日這樣嚴峻。現在卻是犯罪浪潮迭起，罪案率每年以60%的速度遞增。上述這些問題在今天幾乎都已充分暴露，中國民眾已開始在問：這改革到底是使哪些人得利？可以說，現在一旦爆發危機，就很容易引起危機共振，難以收拾。而失業問題與流民問題，尤其是後者，將來必是中國動亂之源。

然而，林毅夫以及某些中國經濟學界學者所作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我不敢恭維，這些研究食洋不化，對中國社會現實缺乏經驗性了解。他那些對策式的研究常發表於《戰略與管理》雜誌上，那些一廂情願的公式和推理從紙面上看倒是很漂亮，只是所談的那個「中國」並非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他希望引起注意的「高層」，也未必喜歡他們那些對中國並無實效的「萬字平戎策」，因為那「藥方」並不管用。而張維迎、盛洪等人前些年喜歡上「奏折」談「對策」，現因朱副總理從去年起已不再請他們每隔兩星期去國務院講課（據說講課也就講了三個月左右），於是都換了另一套拳路。張維迎現在專門論證「腐敗有理」，有利於推動社會轉軌，說中國現在根本不是講「公正」的時候，必須將「公正」二字拋諸腦後，提都不要提起；盛洪則聲言要搞「騙子經濟」，「騙出

一個新體制來」。兩人都在竭盡全力地迎合既得利益者的需求。這些說法表明經濟學界的缺乏良心和人文關懷精神。

讀者 深圳
96.12.6

應提出大陸學界的真問題

從貴刊96年12月號得知傅偉勳先生的故世，實在悲痛。傅先生最為人尊敬的地方在於他的開放性，時下被稱為「士人」的，正就是缺少這一點。《二十一世紀》的條件與特點，實際為溝通中國學界與外間聯繫的橋梁，這些年來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尤其是通過刊物，像是一條紐帶，將海內外學者聯結了起來。只是時下學術界提出的許多問題，甚或是一些熱點問題，都是由海外學人提出的，貴刊能否引發大陸學界獨立思考一些問題，不要

老跟在別人後面瞎嚷嚷。譬如去年崔之元的文章，根本就站不住，用的也還是「洋」理論，卻無一條貼近事實。他提出了那麼嚇人的問題，只能使人感到他是「食洋不化」，且教條得讓人作嘔！

我近來情緒極壞，感到壓抑得透不過氣。唯一可以自慰的是，不論怎樣，我還在讀書、思考問題，沒有浪費時光。

讀者 北京
96.12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37期何蜀〈文革中的外國造反派〉一文，作者簡歷中著述《紅岩春秋》應為《紅岩千秋》，謹此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19 侯登科：《旗手》。

頁24 賀延光：《茶館》。

頁37、98、108、140、143、145、156 資料室圖片。

頁41 Gerald Steffe: *Mask*.

頁44、45 唐小梅：《溫泉兄妹》(1996.7)。

頁60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下冊（香港：東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頁363。

頁84上 Raymond Mason: *The Departure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from the Heart of Paris* (1969-1971).

頁84下 Raymond Mason: *The Latin Quarter* (1989).

頁81-83、86-90、封底 Original sketches of *The Departure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from the Heart of Paris* by Raymond Mason.

頁91 劉濞作品。

頁94 Käthe Kollwitz: *Die Mütter*.

頁118 *Science* **274**, 1600 (6 December, 1996).

頁119 *Nature* **384**, 415 (5 December, 1996).

頁121左 *Nature* **384**, 440 (5 December, 1996).

頁121右 *Nature* **383**, 305 (26 September, 1996).

頁122 *Science* **274**, 1841 (13 December, 1996).

頁123 *Nature* **382**, 224 (18 July, 1996).

封三 Raymond Mason: *The Grape-Pickers* (detail, 1982).